

农民、大学生、硕士研究生、农学家、烟草栽培专家、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、诗人……要在一个人身上有机地凝聚如此多的社会符号,并且自然妥帖,很不容易,但王绍坤做到了。

采访中,王绍坤多次自然地强调自己来自农村,曾经是农民。

的确,他这一辈子始终和“农”字滚打在一起——本身是农民,干过农活,读过两所农业大学,几乎天天和农田植物(烟叶)打交道,王绍坤也以此而骄傲。

漫溯他自1978年以来的读书和做事业的经历,一个“农”字串联连了王绍坤这些名头,也串联了他的事业。

或者,如果用一种绘画的颜色来框定王绍坤这35年的阅历,主色调就是一个“绿”字,他的学业和事业都碧绿如连天的芳草。

同时,他还是一个多愁善感的诗人,和著名的永远年轻的诗人海子一样,对土地,对庄稼,对农民有着骨血相连的情感——本文大标题来自海子《十四行:王冠》里的诗句。



王绍坤在他的“车间”里

“用你美丽的叶子，缠绕我的竖琴”

——王绍坤的“农事”与“诗作”纪事

□本报记者 陈昌云

一片绿叶在王绍坤心中的分量

2013年的中秋节之前和之后,我采访了王绍坤两次。

“我在大学学的专业是植保,读研究生的专业是植物病理学,也就是学防治植物病、虫、草害,烟叶作为植物,它的病虫害的防治也和其他植物一样。”

每次和王绍坤聊天,感到很舒服,他真诚厚道,平实平和,交谈中总是不断提醒记者,“不要把我写得太好。”

对人对己、对事对物,他认识问题总是力求平和,担心走到极端。

王绍坤担任过红云红河集团的原料部长,现今,虽然他的头衔是集团总裁助理、调研员,但依旧协助总裁主抓整个集团的原料工作,其实,无论是在曲靖,还是在昆明,从1986年9月以来,王绍坤和那片绿色的叶子打交道已经整整27年了。

只要具备起码的生产乃至生活常识,没有一个人会对生产原料的重要性等闲视之。一切物质生产都涉及原料,它是一切物质生产的前提和基础,因此,对于红云红河集团这样的国内大型烟草企业来说,“原料”两个字相当厚重,其重要性绝不亚于有了原料以后的所有生产工序,王绍坤对此的解读是:“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说,我认为,原料是本质的。”

“原料是基础,否则生产就是无源之水,无本之木。”王绍坤说,“几十年前,云南曾经因为原料缺乏,卷烟时烟叶中不得不掺入冬瓜叶、荷叶等替代物,此外就是从国外进口一些。”

“你的爱比他们伟大得多，你让我自由”

在近40年风雨如磐的时空里,谁能想到一页菲薄的白纸竟然铸就了一个年轻人的绿色命运。

1974年7月,17岁的农村青年王绍坤在高中毕业后很“自然”地回到农村“修理地球”。

看着死气沉沉的乡村,每日过着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周而复始的乏味生活,王绍坤很绝望。他回忆说:“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3年,当时感到自己永远难有作为了。”

从某种角度上说,王绍坤的痛苦感,是来自他心性的踌躇奋发与挣扎于绝望现实的无奈,这个从初中就开始以诗言志的年轻人,觉得自己有舒翼苍穹之志,却终其一生可能都要抑郁地凿井而饮,耕田而食,心中颇为不平。

但机遇终究要眷顾有志者。

1977年,伴随改革开放的先声,国家恢复了业已中断10年的高考,王绍坤精心准备,毅然报名逐鹿考场。

命运女神青睐了这位20岁的年轻人,他幸运地成为中国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——来自云南农业大学的一纸录取通知书将他的命运逆转了,“原来以为自己这一辈子就是在农村修地球了。”

他说,他当时竟然是“喜极而泣”。

高考几个月后,在1978年3月28日这天,王绍坤收到了来自云南农业大学植保专业的录取通知书,极度亢奋下,他写下了一首直白质朴的《收悉七级级高考录取通知书》七言古体诗,记录他绝望中迎来人生转机的激动心情。

王绍坤承认,后来迄今35年的人生历程证明,的确是这页菲薄的纸片,改变了自己的一生。

马克思是从人的社会关系角度来定义“人”及“人的发展”,他在《政治经济学批判》一文中说过:“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它一切人的发展”。

王绍坤个人的发展同样获益于“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它一切人的发展。”或者换句话说,拜其所遭遇的时代所赐。

用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诗句说,“你的爱比他们伟大得多,你让我自由。”

4年本科毕业后,1982年1月,王绍坤经分配回到当时的曲靖地区农业局工作,“先是到行署人事局报道,我们一共21名大学毕业生,乘坐一辆车回到曲靖,此时临近春节,按人事局安排先回家休息过年,年后才上班。”

上班后,王绍坤被派遣到嵩明县杨桥公社蹲点,“我在公社农科站挤时间看书,准备参加5月份的研究生考试。”

仅仅工作半年多一点,同年8月,王绍坤考上了湖南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学硕士研究生,再度过上了在教室、宿舍、图书馆、食堂几个点轮回的学生生活,又是3年后,1985年7月,已经是硕士研究生的王绍坤从湖南“跑”回云南,来到他的本科母校云南农业大学任教。

王绍坤当时想教书,云大、师大都要他,他自己觉得自学的是农科,在那些大学教书不太“科班”,云南农大也要他,于是就回母校工作了。

在农大工作了一年多,1986年9月,王绍坤调回曲靖,来到地区烟草科研所工作,开始了他作为“烟草人”的生涯。

“只要我一息尚存，我就称你为我的一切”

大地清澈得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女人,农民出身的王绍坤觉得自己从她那里来,还是应当回到她怀中去。

这次回到大地,他选择的媒介是烟草。

“从农大出来,可以选择到很多单位去,为什么要到烟草?”王绍坤说:“当时烟草很冷门,学我这个专业的,大多把目光投注在水稻、玉米、麦子等主流农作物,关于烟草,当时就连资料都极少。”

这里需要饶舌的是,王绍坤想到烟草科研所工作,与今天人们对烟草行业的种种艳羡毫无关系,那时节的烟草行业不像今天这样摇曳多姿,成为年轻人求职的“焦点”,相反,烟草行业很不受人待见。

碧绿的烟叶,有着美丽的忧伤,“比如花叶病号称烟草之癌,至今没有根治办法,但我们后来采用综合防治,基本把它控制住了。”但这些需要克难的领域,恰好给刚进而立之年的王绍坤一个自由翻转腾挪的巨大空间。

王绍坤记得,当时的烟草隶属于供销社下面的经济作物公司的一个分支,那时效益极差,供销社与烟草分道扬镳时,“往往是被认为表现不好的人才被分到烟草公司。”

他从“冷”烟草中触摸到了即将来到的“热”脉搏。

“当时的烟草病虫草害很突出,影响了卷烟的产量质量,我如果投身这个行业,可以干出点成绩。”王绍坤从自己专业技术角度出发看到的“热”点。

更重要的是,结合他所学的专业,继续踵武前人,研究水稻、玉米、麦子等主流农作物,要想出点成绩,殊为不易,但由于烟草的“冷门”性质,不被包括农业科研人员在内的一般人看好,反而给他提供了一个扳起翘翘的浩瀚天空。

王绍坤坚信,面对烟叶的病虫害防治,只要自己迈出一小步,就是这个领域的一大步。



王绍坤工作照

采访中,王绍坤反复“唠叨”的一句话是:“我是农民出身,研究半天不能解决实际问题,我会于心不安。”

1986年9月的一天,王绍坤来到曲靖地区烟草公司烟科所报到,正式成为烟草人的一员,烟科所只有十二三人。

随着他回到曲靖工作,不经意间还书写了曲靖地区8县1市的高学历历史,“当时曲靖全地区有540万人,我的学历最高。”



王绍坤与苏童、于坚等文化名人在一起

报到后,王绍坤请缨要求下乡,把当时曲靖地区8个县1个市全部跑一遍,他人地两生,而且当时出差还时兴要“介绍信”,王绍坤要一口气跑完全地区,曲靖地区烟草公司给他开的“介绍信”采取了笼而统之的“通称”,王绍坤还记得,“介绍信是这样开的——各县市烟草公司,兹有本公司烟科所王绍坤同志到你地考察烟叶,请予接洽。”

凭着这张“介绍信”,他带着两双鞋,一双绿色的“解放鞋”,一双皮鞋就下乡了,没有照相机,他就用笔记,采集标本,“对烟叶的病虫害,我知道的就给当地公司的同志讲,不知道的,就采集标本带回来用显微镜分析。”王绍坤花了23天把曲靖地区全部县市跑遍了个遍,“做到心中有数,给领导递交了一份考察报告,提出建议,供他们决策参考。”

“我写的报告一是有参考作用,再是给领导留下了好印象。”时年不足30岁的王绍坤,其工作表现令公司领导满意,“那时候下乡很艰苦,谁都怕下乡,我是研究生还主动要求下乡,领导很高兴。”

工作局面打开了。

后来,连续6年,王绍坤都蹲点下乡,搞优质烟示范和病虫害防治,当时缺乏有关烟叶培育和病虫害防治的书和资料,王绍坤就靠试验示范,“对了就做示范,不对就自己试验。”花了6年时间,他把曲靖地区大部分烟叶的病虫害规律搞清楚了,然后拿出一个整

治方案,做优质烟叶生产试验和示范。“渐渐地,烟叶质量高了,烟农收入逐渐增加了。”

这期间,王绍坤真正回到了农民的点位上了,整天一身水一身泥地在田地间和酷热泥水搅在一起,“搞农业就得吃苦,不到田里,不蹲点,不和农民打成一片,人家不理解你,还要用他们的语言来说话。你不是什么官,要人家信服你,你搞科技要推广,要和农民打成一片他才接受,科技不能推广,搞了半天还有



什么意义?”

甚至为了和农民打交道,本来不吸烟的王绍坤也开始吸烟了,“下乡蹲点,要和农民接触、交往,烟是媒介,还有一个原因是,我要知道烟叶味道好不好,自己不会吸烟不行,于是从1990年开始吸烟了。”

研究生毕业后工作后,除了短短一年的大学教师生涯,王绍坤这辈子全部贡献给烟草事业,借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一句诗,那就是“只要我一息尚存,我就称你为我的一切。”

“当我们大为谦卑的时候，便是我们最近于伟大的时候”

云南有个县叫富源县,该县位于云南与贵州两省交界处,该县有一个原名“雨汪”,2001年改名“十八连山”的乡镇,在某网站关于该镇的介绍中,烤烟的生产占有重要地位,“十八连山镇是农业大镇,粮食作物以包谷、小麦、水稻为主,经济作物以烤烟、油菜、生姜为主。”

这36个字的介绍,与王绍坤颇有渊源。

“我从1989年到1991年都在当时的雨汪乡卡锡村公所蹲点,搞了两三千亩的优质烟叶防治病虫害示范田。”

这片烟田的烟叶蓊郁茂盛,与其周围的其他烟田的烟叶形成鲜明反差,时任曲靖行

署常务副专员的李文选恰好来乡下调研,看到王绍坤带人培育的烟田枝叶扶疏,绿油油一片,长势甚为喜人,感到很惊异,便问随行村民这是咋回事,“烟叶长得这样好,谁种的?”村民告诉他,“是曲靖地区烟科所的王绍坤老师指导我们种的。”

村民还告诉他,王老师还是研究生,李专员兴趣大增,掏笔将王绍坤的姓名记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上。

那天李专员没有邂逅王绍坤,但从烟叶的好印象上移植了对王绍坤的深刻印象。

到1992年的一天,行署开会研究烟叶生产方面的工作,王绍坤因为烟科所领导出差,就代为出席会议,会议就是李文选主持的,在聆听王绍坤建议怎样解决生产上的问题时,李文选认真做笔记,听完王绍坤的工作建议后,李文选突然问:“你在烟科所工作?你叫什么名字?”

得知这个年轻人就是王绍坤,李文选高兴了,说:“我正在找你呢,基层的同志对你印象很好,反映不错。”

也就是这个机缘,王绍坤不久担任了曲靖地区烟草公司生产科副科长,算是行政管理工作的开始,“还是以科技为主,顺带些小小的行政管理工作。”

显然,这个小小的副科长,是王绍坤“仕途”的试水之作,然而,王绍坤对烟草科技意兴甚浓,始终没有放弃自己为之钟爱难舍的科技事业。

以后的几年里,年近不惑的王绍坤在烟草科技方面成就迭出,他个人在行业内获得了许多荣誉,当然,最令他高兴的还是,曲靖地区烟叶病虫害防治效果开始在全省崭露头角。

后来担任了烟草公司生产科科长以及行署烟办主任,再后来,他出任过地区烟草公司副总经理、总农艺师、曲靖卷烟厂副厂长,红云红河集团成立,他又出任集团原料部部长——无论职务怎样变,王绍坤一直在和烟叶打交道,“我负责搞基地建设,田间管理,采购调拨烟叶,简单来说,烟草生产程序里,制丝之前的工作都是我们在做。”

王绍坤使一片绿叶健康成长,这片绿叶同时也成就了“王绍坤”这三个字的分量。

2002年,王绍坤被国家局评为全国首批烟草研究员,2003年,被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。2013年,被评为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原料技术科技领军人才。

尽管如此,王绍坤依旧兢兢业业俯身在灰尘飞舞、气味刺鼻的烟叶中,或者游走于田间地头,泰戈尔说:“当我们大为谦卑的时候,便是我们最近于伟大的时候。”

就此而言,王绍坤相当的谦卑。

“赋到沧桑句便工”

正如每个人都多重性一样,王绍坤也不例外。

前述他的头衔里,记者故意漏列“诗人”这个称谓,以便给人以峰回路转之感。

农学家兼烟叶专家王绍坤竟然同时是诗人。

他写诗有年,说他是“诗人”并不为过。

以1978年3月28日王绍坤收到了来自云南农业大学植保专业的录取通知书,极度亢奋下,他写下《收悉七级级高考录取通知书》七言古体诗为标志,在琢磨烟叶之外的余暇,王绍坤的诗歌创作已经有35年了,其作为诗人的历史,甚至比他的主要角色——烟草科技专家的历史还要漫长。

更早,其诗歌爱好乃至创作可以溯及中学生时代,“我上初中、高中时就开始喜欢诗歌,觉得中国古诗体,文字简略,有韵味,易读易记,短短几行诗,包含着许多道理。”

王绍坤认定古诗诗——而非对仗严谨、韵脚苛刻的律诗——才是诗的本色,也是最好的表达样式,“古诗诗既不失其明白晓畅,又保持必要的韵律和整齐,便于记忆和诵读。”

在王绍坤迄今190多首诗作中,你会读到杨丽萍、云南白药、云烟、孔雀舞、西山龙门、圆通钟声、神丹10号、普洱茶……这些林林总总又似乎绝不搭界的吟诵对象。从自然

到社会,从人事到环境,从工业产品到心情感悟,几乎无一不囊括。

19世纪的俄国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评价莎士比亚时说,“莎士比亚是一位最伟大的创造性天才,首先是一位诗人,那是毫无疑问的。可是如果有人在他的诗中看不到丰富的内容,看不到给心理学家、哲学家、历史家、政治家等提供出来的教训和事实取用不竭的宝藏,那就是太不了解他了。莎士比亚通过诗传达一切,可是他所传达的绝不仅是属于诗的东西。”

别林斯基还说过,“每个民族的诗都是人民意识的直接表现,因此,诗和人民生活是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的。”

王绍坤多半没有读过别林斯基的这段话,可他的作品就是这段话的注脚。

作者处于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现实生活中,出于内心的良善,以及诗人的“愤怒”,总是要抨击一些令人反感的——即使仅仅是《醉鸳鸯》——社会现象,但同时,他也从诸多的正面,给人以鼓舞奋进的号角声。

从《游陆良彩色沙林》到《孔雀舞》,无论是吟诵大自然的奇崛之美,还是渲染人体舞蹈的律动,作品总是给人以昂扬向上的美感:

孔雀亮翅羽开屏,化身舞杨丽萍。
翩翩劲舞真善美,撒播人间大雅情。

杨丽萍舞蹈语汇变成了王绍坤的诗句。

从一阙舞蹈中,王绍坤不仅读出了人体之美,还悟到了透过形体现象的人的良善与真情。

文艺作品从来都是生活的实践与感悟后的某种升华,脱离作家个人生活的作品被认为是荒诞不经的,19世纪的俄国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,“文学脱离了生活,假使也能够产生杰出的作品,这该是一般规律的奇怪例外。但是我们已经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谈过,这种事件是从来就不会有的。”

“诗是文学作品”这个断语当然没有问题,但并不全面,甚至不准确。

因为,诗作为文学作品,它的记录功能尤为明显,晚近,陈寅恪先生的范例是,从现存5万多首唐诗中解读唐代中后期经济重心向东南部偏移的历史,从而铸就了“唐诗就是唐代的经济史、社会史”的不刊之论。

展读陈先生之《唐代政治史论稿》,可以看到一些论据就来自唐代诗人的诗作。

譬如,从白居易《琵琶行》“商人重利轻别离,前月浮梁买茶去”诗句中,既可以撷取中国古代对商业的某种轻贱之态,也可窥豹1300年前的唐代茶叶贸易兴盛的景致。

以故,作为文艺作品的诗歌,某种角度,就是一部记录作者生活时代的历史。

王绍坤的一些作品也就是他用心用情为明天记录下来的历史,比如这首《雾霏天》的上阕:

雾霏笼罩怪不行,行人车辆路难行。
粉尘颗粒漫天舞,喉鼻燥痛难安宁。

说它是诗,当然没错,而若干岁月后再看,恐怕就不仅仅是“诗”这个概念可以界定它的了。当然,今天已经有记载历史的录音、录像等十分先进的声光电设备,以后也能长期保存,但以文字的诗的角度记录,和电子设备的记录还是不一样,而且,它会成为电子记录设备的理性补充。

最主要的是, 诗的记录融进了作者对大地、对天空、对人类饱含的浓情厚义。

再如在《文山会海》一诗中,诗人吟诵道,“大文件插小文件,内容雷同千万篇。小会大会会连会,套话空话喋不闲。”

以后的历史家如果要研究今天的官场病,这四句诗文绝对是一个简练生动的好视角,寥寥28个字,把当下社会的某种病态描绘得淋漓尽致。

在文学批评史上,诗人、醉汉、恋人、疯子是被归为一类的,诗人以其敏感、多情而著称,每每不为常人所理解,王绍坤的一些作品也如此,他的兴奋点并不止于对烟草业的关注,责任心也不止于对自己赖以立足的行业的担当,他总是把触角散发延伸到看似一些无关的景致上。

清代著名史评家赵翼在其《题元遗山集》中说:“赋到沧桑句便工。”

或许,这就是时代给作为诗人的王绍坤带来的奋飞空间。